

守望者的悲壮与无奈

刘希云 著

Shouwangzhe de Beizhuang yu Wu nai de Zi

Wunai

——20世纪30年代

四派文人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德州学院学术出版资助

守望者的悲壮与无奈



——20世纪30年

刘希云
Shiouxunzhe de
20 Shiji 30 Nian dai

自由派文人

Yu Wunai
Wenren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守望者的悲壮与无奈：20世纪30年代的自由派文人 /
刘希云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 11
ISBN 978 - 7 - 5161 - 4908 - 9

I. ①守… II. ①刘… III. ①自由主义 - 文学研究 -
中国 - 民国 IV. ①I206. 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28862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曲弘梅
特约编辑 大乔
责任校对 郝阳洋
责任印制 戴宽

出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158号(邮编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中国社科网 010-64070619
发行部 010-84083685
门市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4年11月第1版
印 次 2014年11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20.5
插 页 2
字 数 326千字
定 价 59.00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010-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李新宇

这本书是刘希云在博士学位论文基础上修订而成的。

从研究对象看，是两个刊物——《现代评论》和《新月》，选题似乎并不新鲜，因为这两个刊物都有人研究过，尤其是《新月》，从杂志到“新月派”，从它的诗人、评论家到精神领袖，多年前就已成为热门，研究成果颇多。刘希云把这两个刊物连接起来，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是否能够生出新的意义？

研究者面对研究对象，的确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甚至是盗者见盗，淫者见淫。鲁迅说过：“譬如勇士，也战斗，也休息，也饮食，自然也性交，如果只取他末一点，画起像来，挂在妓院里，尊为性交大师，那当然也不能说是毫无根据的，然而，岂不冤哉！”（《题未定草六》）这段话很少被学者引用，但在我看来，却应该是学者的座右铭。尤其是在我们这个时代，舍本逐末、舍重就轻已经成为学界时尚，舌尖和裤裆都被放大，头脑和心灵却被忽略。原因当然不难理解：首先，研究者能够发现的东西，都必然是自己心中有的。如果心中没那个概念，自然会视而不见，读不出那层意思。发现或发明都需要相应的知识准备，而我们这个时代的学者，在知识准备上却普遍存在着某些残缺。其次，面对勇士，是看他的战斗，还是看他的吃相，还是观察他的裤裆，显示着观察者的趣味与品位，而这趣味和品位又往往是时代规约造就的。在这种情况下，某些领域的研究成果颇多却相约忽略某些问题，就不足为怪了。

从这个意义上说，刘希云可谓捡了个落儿：既然一群群的淘宝者眼睛里只有金子，而对宝石视而不见，一个认识宝石的人，当然可以在别

人挖掘过的矿坑里收获。

回到刘希云对选题的处理方式，把这两个刊物连接起来，到底能为我们展示什么新东西？这首先要从这两个刊物存在的年代说起。《现代评论》创刊于1924年，1928年停刊；《新月》创刊于1928年，1933年停刊。两个刊物所经历的这段时间里，中国发生了许多事。其中最重要的，是国民革命高潮的兴起和继之而来的北伐战争，然后是“民国易帜”，五色旗变成了青天白日旗，国民党人建立了一党专政的新政权。从1930年代开始，国人就逐渐习惯了按照国民党人的意志对这次历史转折唱赞歌，以致今天的海外学者也在高谈此后十年的“黄金时代”，然而，如果换一个视角观察，这又是东方第一个民主共和国遭遇严重危机的时期，是中国人辛辛苦苦告别“帝国”而迎来的“民国”变成“党国”的一个时期，也是思想文化界大分裂的一个时期。只要超越国民党人所开创的那种历史叙述，就不难看到知识界在这次历史转折过程中的复杂态度：王国维投湖自杀，梁启超忧心忡忡，张奚若大声疾呼，章太炎一次次厉声断喝，当民国终于成为党国之后，章太炎又自称“民国遗民”，拒绝做党国的臣民。同样是革命前辈的马君武，则与胡适有这样的对话：“当日有国会时，我们只见其恶，现在回想起来，无论国会怎样腐败，总比没有国会好。解决于国会会场，总比解决于战场好得多。”“当日袁世凯能出钱买议员，便是怕议员的一票；曹锟肯出钱买一票，也只是看重那一票。他们至少还承认那一票所代表的权力。这便是民治的起点。现在的政治才是无法无天的政治了。”（《胡适日记》1929年4月26日。）

那么，作家们在这个过程中感受如何？表现如何？追随国民党的作家自不必说，他们是胜利者，当然有理由欢呼；追随共产党的作家也不必说，过去大半个世纪中国大陆的文学史讲的就是他们的反应。然而，那个年代的中国文坛却并不只是由普罗文艺和三民主义文艺两脉构成，《现代评论》与《新月》所聚集的，就是另一些文人，他们大多有留学海外的经历，政治上热衷于民主宪政，对自由一往情深，本来是一心一意要在东方这个新生的民主共和国推进全面现代化的，却遭遇如此巨变，当然不会无动于衷。那么，他们到底想过什么、做过什么？刘希云关注这两个刊物，正是要回答这些问题。

应该说，她的目标已经部分实现了。虽然由于认识上和技术上的原因，她的挖掘还不到位，触及的也未全被珍惜，语言表述也常把自己独到的发现搅拌于前人的陈旧言说之中，但收获已经可喜可贺。

由于研究目标的需要，本书的写法有点特别，如果不细想，也许不明白她的用意。比如第一章，叙述《现代评论》的创刊，先从刊物的问世写起，然后考察作者队伍，一个个说来，平铺直叙写传记，而且高度重视他们的出身和学历，留学哪个国家，学的什么专业，都一一说明，有这个必要吗？当然有，因为这样才使我们清楚看到了这个刊物聚集的是一群什么样的人，看到了他们本来的理想和追求。这群人聚在一起办刊物，究竟因为什么？他们遇到了什么问题？这是本书入题之后首先考察的一个问题。带着这个问题，作者考察了《现代评论》创刊的背景，写出了1924年北京以及全国的舆论氛围和思想文化新走向。沿着这样的思路，一系列大事都不再与她的研究对象无关，而且结论自然形成：“1924年的北京并不平静，10月份发生了冯玉祥领导的‘北京政变’，监禁了总统曹锟，11月份请出段祺瑞就任中华民国临时执政，并电请南方的革命政府大元帅孙中山来北京共商国是。胡适、王世杰、高一涵等自由派知识分子在关注着这个国家往哪个方向走。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在纷乱的时局面前好像已成了很遥远的事。他们要对时代发言，于是决定创办一个刊物……”作者既分析文学文本，又叙述历史事件，从“首都革命”、“善后会议”一直写到“三一八”惨案，展示了这群自由主义者所遭遇的事件，写出了他们艰难的步履，一直写到刊物的无奈终结。

《现代评论》停刊了，《新月》冉冉升起。在刘希云的眼里，《新月》的创刊是自由主义者的再集结。而这次集结所应对的，是一场更严重的危机：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出现的新的政治和文化环境。为了把问题说清楚，作者详细介绍了《新月》创刊的背景，凸显了北伐战争之后“民国”变“党国”的那段历史，以及这种变化对这个文人群体的理想构成的威胁。于是，胡适领导的人权运动顺理成章，不再是孤立和突兀的事。一群文人对抗一个新生的国家政权，结果不难预料，刘希云写出了《新月》的处境，写出了这群人与党国体制的矛盾，也写出了他们在国家权力、民间反抗力量、民族文艺、普罗文艺之间所受的多

重挤压；写出了他们的左冲右突，写出了他们悲壮的抗争和守望，也写出了他们无奈的结局。总之，通过《现代评论》到《新月》，使我们看到了一部分知识分子在从“民国”到“党国”这个转换过程中的抵抗和守望，看到了他们的悲壮和无奈。

在这个主题之下，对作家们自然会有新的理解。比如，徐志摩、沈从文等，他们的痛苦和忧虑究竟因为什么，沿着这个线索，自然会看到他们所面对的时代所出现的堕落、病态和不人道。他们为什么强调伦理、强调道德，为什么要呼唤人性？因为种种力量正在使国人失掉这些。他们为什么要呼唤文学的“健康”、“理性”和“尊严”，因为生活中出现了不健康、不理性的时代大潮；因为在一些作家那里，文学已经沦为工具或奴婢。这一切，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入地认识这些自由派作家。

此外，刘希云的一些见解也是值得称道的。比如，她认为在1920年代的混乱和转折中，主角是国民党与孙中山。“该主角的特点是宣传辞藻异常华丽，具有很强的鼓动作用，能够吸引年轻人，使政客和武夫的防备松懈。……在破坏辛亥革命成果的过程中，国民党应该负一些责任。”再比如，她发现面对民国易旗帜这样的大事，“五四”时期的北大教授和弟子们态度大不相同，先生们往往怀疑、观望甚至抵抗，学生们却大多追随新潮，投奔革命去了，“罗家伦、傅斯年、段锡朋的这一变化，对他们的老师，对自由主义本身，都是无情的嘲弄”。这一切，都显示着作者的独到见解。

最后，我想对希云说几句与本书相关的题外话：

一、我希望这本书不是该课题研究的终点，而是一个起点。因为一些话题还有待深入展开，文献资料的搜集和使用也应有拓展。独到的研究应该能够打开别人没有关注的天地，更多地论述一些别人未曾关注的论题，更多地展示一些别人不曾用过资料。具体地说，本课题若想做得更深入，需要大量的历史文本，这不仅包括当时的相关报刊，还包括当年的政府文档、政党文件、私人日记和书信等。那些材料可以打开一片新的天地，使一些模糊的问题豁然开朗。

二、好的论文需要注意两重对话：一是与研究对象的对话，在这里就是与《现代评论》和《新月》那些作者和编者的对话，只有不断进

行这种对话，才能深入探讨研究对象本身的问题；二是与已有研究成果的对话，也就是与同行专家的对话，通过这种对话，才能确定你对该课题的研究是否建立在前人基础之上，才能知道你的研究是否能够对前人有所超越，以及这种超越的程度。

三、关于名词术语和语言的更新。时至今日，作为严肃的学者，必须有语言的自觉。其中重要的一点，是剔除旧教科书所给予的某些词语，谨慎对待那些意识形态化的语言，而使用严谨的学术语言。比如“旧社会”、“新中国”、“解放前”、“建国后”，在使用的时候，就应该考虑是否能够与港台及海外同行对话。如果一个硬说“解放”，一个硬说“沦陷”，就成了有意挑起事端，影响两岸关系。再比如，“反帝反封建”之类的词语，一般人在一般文章中随便说说未尝不可，因为共同的教科书已经使它成为约定俗成。但作为学者，尤其是在研究胡适等自由主义者，却不宜继续使用这样的词语，因为他们既不承认这个“革命任务”，也不使用这些词语。包括“封建婚姻”、“封建专制”这些似通非通的词，当时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也是不用的，我们论述他们，不应该把他们拒绝的东西强加给他们。有人研究胡适，而大谈其“反帝”、“反封建”，胡适如果活着，是会起来抗议的，因为他从来不曾“反帝”、“反封建”，也不认为有那个必要。至于“资产阶级文人”之类，使用时也应谨慎，因为同样的家庭出身和经济地位，有的被说成是“无产阶级”，有的则是“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这本来就是一笔糊涂账，严肃的学者不应继承这样的遗产。

希望希云在不久的将来能够拿出更精彩的研究成果。

天津社会山寓所

2014年7月

摘 要

本书力图在还原历史语境和自由主义文学的创作生态的基础上，以历史的发展为线索，以《现代评论》和《新月》两份刊物为主要研究对象，揭示自由主义文学在 20 世纪 20 年代中期到 30 年代初期发展和演化的历程，阐释其在时代文化发展演变的大潮中、在左翼文学和民族主义文学的双重挤压下，坚持文学的独立性，坚守人生的艺术的努力，以及这种努力所遭遇的各种尴尬、无奈所显示的历史文化内涵。

第一章写的是《现代评论》的创刊，背景是 1924 年北京的社会舆论氛围和文化走向所发生的变化。正是在这个背景上，一群自由主义者聚合起来，试图发出自己的声音，守护他们的理想。第二章论述的是《现代评论》的文化选择，其坚持理性主义文化立场，是对“五四”的启蒙主义传统的继承，也是对他们固有的梦想的守护。第三章对发表在《现代评论》上的文学创作进行了考察，通过原始材料的解读，揭示了他们人生与艺术并重的追求，从中不难看出这些作者对文学与人生理想的某种坚守。第四章结合具体历史事件，如善后会议、陈鲁之战、“三一八”事件，分析这群自由主义者所遭遇的艰难，最后以刊物的无奈终结告终。但是，自由主义者并没有消沉下去，离开北京，他们又来到上海，创办了《新月》。第五章阐释的是《新月》的创刊，它是自由主义者的再集结。这次集结，应对的是新的危机——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中国出现的思想文化及其政治环境的变化。第六章谈新月派的文化选择，以胡适的《我们走哪条路》和徐志摩的《新月的“态度”》为中心，分析新月派的政治态度和文学态度。第七章考察了《新月》上的文学创作，诗歌、戏剧、小说方面所达到的艺术高度，显示了他们文学

守望的成就。第八章以鲁迅和梁实秋的论战、胡适和徐志摩的论争、人权论战为例，谈新月派对时代的抗争以及刊物最后的无奈终结。第九章以现代评论派和新月派为例，阐释自由主义文学的文学史价值。

自由主义文学的艺术追求，不同于左翼文学和民族主义文学，拒绝把文学视为党派政治宣传工具，因此创作出了一批审美价值较高的作品。本书总结了其创作给文学的健康发展带来的经验，那就是坚守文学的本体论，坚持在创作上以人为本，尊重作家的主体人格，从对文学的认识创作取材到创作主体的姿态，都坚持了文学创作的艺术规律。但是，由于20世纪30年代特殊的时代语境和创作生态，他们高蹈的自由主义理念和文学理想在现实中总是遭遇尴尬，最终无奈地进入文学边缘。

关键词：《现代评论》《新月》 自由派作家 反抗 无奈

目 录

绪论	(1)
一 选题的缘起与意义	(1)
二 本课题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12)
三 本书的基本思路、研究方法 with 目标	(21)
第一章 《现代评论》的创刊	(23)
第一节 刊物的问世	(23)
第二节 作者队伍的构成	(27)
第三节 他们遇到了什么	(37)
一 北京政变和善后会议	(37)
二 胡适与国共两党的政治冲突	(44)
第二章 《现代评论》的文化选择	(53)
第一节 理性主义的文化立场	(53)
一 对理性的尊奉	(55)
二 反传统的文化态度	(59)
第二节 “五四”传统的薪火相传	(68)
一 国民革命高潮对“五四”新文化的瓦解	(68)
二 新文化阵营的分化	(70)
三 《现代评论》的文化思考	(72)
第三章 创作:艺术人生梦想	(99)
第一节 《现代评论》文学创作概况	(99)

第二节 人生与艺术并重的小说创作	(103)
一 关注社会的现实态度	(104)
二 自然与人的自由	(107)
三 自我的寻思:独立人格	(109)
四 隐喻和象征:至善至美之境消失的忧虑	(111)
第三节 空灵、挚情的诗歌创作	(113)
第四节 现代评论派散文的内涵	(117)
第五节 现代评论派的文艺思想	(128)
一 以人为本的文学思想	(128)
二 尊重文学自律性的文学观	(130)
三 主张文学的“独立自由”	(134)
四 追求“‘射他耳’(satire)的文体倾向”	(136)
第四章 “现代评论派”的艰难处境	(139)
第一节 《现代评论》与善后会议	(139)
第二节 陈西滢与鲁迅的笔墨官司	(144)
第三节 如何面对“三一八”	(152)
第四节 无奈的终结	(158)
第五章 《新月》的创刊	(162)
第一节 自由主义者的再集结	(162)
第二节 《新月》的作者队伍	(166)
第三节 新政权建立之后的抗争	(174)
一 国民党的训政	(174)
二 胡适、罗隆基的抗争	(176)
第六章 新月派的文化选择	(189)
第一节 “新月”的态度	(189)
第二节 绅士化的文化立场	(196)
一 新月派绅士文化与“五四”新文化	(196)
二 新月派绅士化文学的美学价值	(201)
第七章 一如既往的文学追求	(206)
第一节 纯诗化的艺术实践	(206)

第二节 纯形与写意的戏剧	(215)
第三节 沈从文创作中的自由主义理念	(227)
第八章 多重挤压之下的抗争	(241)
第一节 “人性论”与“阶级论”之争	(241)
第二节 徐志摩与胡适的“苏俄问题”论争	(248)
第三节 “新月派”在左右夹击中的人权论战	(260)
第四节 “新月”的沉没	(275)
第九章 “现代评论派”和“新月派”的文学史价值	(279)
第一节 对文学本体论的坚守	(279)
第二节 以人为本的创作原则	(284)
第三节 对作家主体人格的尊重	(287)
第四节 中国自由主义者的命运	(297)
结语	(302)
参考文献	(306)
后记	(312)

绪 论

一 选题的缘起与意义

当前学界的自由主义思潮热，为本书提供了研究的前提和依据。自由主义在中国的曲折命运蕴含着深长的历史意味。作为后发现代性的国家，中国对西方文化的引进总是伴随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在 20 世纪 30 年代的历史文化语境中，民族主义具有强大的号召力，而这种低调的以个性主义和理性主义为核心的自由主义思潮，却只在知识分子群体中获得认同。而走过 20 世纪 30 年代那段战乱年代，自由主义在当下建设法治国家、建设市场经济、倡导公平正义的社会诉求中，又显示了其理论活力。本书力图以自由主义理论为统摄，来透视二三十年代的现代评论派和新月派。

“五四”运动本身引发出了三种不同的社会倾向，即坚持从经济、政治和文化这三个不同角度的革命，它们分别以科学救国、暴力革命和自由主义的文化启蒙为代表。“科学救国论”曾经风行一时，但很快就消失于社会革命的潮流之中，而启蒙思潮则一直作为一个思想革命运动同社会革命相并而行，成为 20 世纪中国社会发展交响曲中的一个“副部主题”。“一个时代的文化是一个统一体，无论它有多少不同分支和表面的矛盾。只要触及其中的任何一部分，它就会揭示自身的秘密：一旦结构暴露，部分就揭示了整体。”^①“五四”文学革命是一个说不尽的话题，它的鲜活之处在于赋予了文学个性张扬的时代特色，具有单纯中

^① [美] 迈克尔·赫尔方：《伊甸园之门——六十年代美国文化·译本序言》，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2 页。

见丰富这一特质，尽管构成它的每一部分都可供反复发现、阐释，但仍不失为构成整体的有机因子；相比之下，20年代末30年代中期的现代文坛，文学或文化整体却笼罩着难以说清的如黄梅雨季节的暧昧氛围，其结构不仅层次难分，且纠葛重重，历史摆在那儿，却很难撩开它的面纱，一窥其真面目。本书试图通过对30年代的自由主义作家群进行考察，揭开30年代的文学秘密正是这样一个令人困惑的过程。

“五四”后延续自由主义的文化启蒙之路的有这么几个刊物：《现代评论》、《语丝》和《新月》。《语丝》是周树人兄弟创办的刊物，而《现代评论》和《新月》都是胡适派的文人创办的刊物。关于《语丝》已有专门的论著，也为了本研究的连贯性，本书拟以胡适派学人作为考察对象，来发掘和梳理30年代的自由主义文学，所以《语丝》暂不列入研究的范围。本书只考察《现代评论》和《新月》这两份刊物，以此为依托，对30年代的自由主义文学进行研究。

一直以来，对于30年代的文学，我们的文学史是以左翼文学为主要叙述对象的，而对于那些在30年代的文学史上留下了丰厚文学作品的自由主义作家的重视则不够。80年代以来，对于胡适、沈从文、梁实秋、徐志摩、林语堂等自由主义文人研究开始启动，现在已经有了大量的研究成果。但是以《现代评论》和《新月》为线索来考察自由派文人创作的研究还有待掘进。期刊研究有其独特的价值，它可以让我们穿越文学史叙述的遮蔽，真正走入文学发生的现场，触摸那些丰富而复杂的历史现象和文化事件。《现代评论》创刊于1924年12月的北京，《新月》创刊于1928年的上海。从《现代评论》到《新月》，基本上反映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发展和流变。这两份刊物在自由主义思想的传承上有连续性，在文学创作的理念上也存在着共同点。

自由主义文学是一种从社会学的角度对文学进行界定的方法。它以自己的方式关注人民群众的生活，关注国家的命运。它主张文学本体论，强调文学的独立精神。它承认外在社会现状对文学的影响，文学必然和社会发生关联，它不是真空的、纯而又纯的。但是自由主义文学强调的是文学在承载其社会功能的同时，应以艺术性为基础。自由主义文学即是在坚持文学的审美自律性的前提下，艺术化地反映社会生活，反

映作家对社会生活的独特观察和思考。自由主义作家大多信奉自由主义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崇尚个性,倡导自由,主张理性,强调思想和艺术的多元化。自由主义文学的基本内涵为:

一、自由主义文学提倡自由主义作为文学的精神内涵,个人本位化,以此认识社会、人生,文学主要表现自我内在的人生欲求和人生理想,而非外在,通过个体来反映人生。梁实秋说,“文学只能是个人的文学,是少数人的文学,大多数就没有文学”;“文学所反映的人性,只能通过个体的生活体验才能表现,普遍的人性。所以真的作品,就是普遍人性通过个人的渗滤的产物”。^① 恩格斯也说文学创作“要莎士比亚化,不要席勒化”。

二、主张文学的独立地位,反对从属于政治,强调作家作为个体的独立性,尊重作家的个性,应维护作家独立的思想追求和艺术追求的权利。作家应如实写社会生活,别把它作为政治宣传的工具,别用统一的东西来框定文学。胡秋原在《阿狗文艺论》中说:“文学沦为叭儿狗,是对艺术的叛逆,沦丧了艺术的尊严,成了被扭曲的艺术。”^②

三、自由主义文学承认人性的普遍性,强调文学存在基于人性的存在,反对用单一的民族性、阶级性取代人性,反对文学直接介入、干预生活,文学应同社会生活、时代保持距离。沈从文认为,文学不能成为时代的附庸,“作家不能记着时代,忘了艺术”。^③ 对人性的理解不能单一化,人性有阶级性、地域性、时代性,应注意其多重内涵。

四、自由主义文学强调文学功能的艺术化、审美性和对艺术素质的重视,反对文学功能的功利化和工具化。朱光潜认为,“文学的本质是艺术,艺术的本质是审美”,“美在艺术上的体现,具体体现为情趣”。^④ 这代表了文学的常态追求。

五、自由主义文学强调文学存在的多元化,提倡不同流派的竞争,主张文学批评持宽容的态度。1936年,沈从文曾发表文章,批评大多

① 梁实秋:《文学的纪律》,《新月》创刊号。

② 胡秋原:《阿狗文艺论》,《文化评论》1931年创刊号。

③ 沈从文:《作家间需要一种新运动》,《沈从文全集》第17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101页。

④ 朱光潜:《谈美书简》,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版,第127页。

数青年作家缺乏独立思想的能力，跟风炒作，创作无个性、无特点，从内容到形式都出现“差不多”的特征。他不无讽刺地说道：“凡事都缺乏系统的中国，到这种非有独创性不能存在的文学作品上，恰恰见出一个一元现象，实在不可理解。”^① 李健吾的文学批评，提出文学的同情心、人性的批评，认为文学的批评方法是理解，一个人性钻进另一个人性。

我们反观现代文学史上自由主义文学的发展，是命运多舛、坎坷崎岖。这首先是因为自由主义文学与自由主义思潮一样，是在艰难时世中生存的。进入民国以后的政治混乱，30年代的抗日战争，40年代的国共内战，使中国人的生存更多是在暴力和血腥的笼罩之下。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成为压倒一切的思潮，反暴力倡改良、呼吁秩序的自由主义没有充分的发展空间。其次是中国实用理性的发达。中国人的实用理性表现在重实际轻幻想、重现实轻未来、重环境轻个体、重人际轻内心等方面。实用理性表现在现代文学中，则是强烈的现世态度，普遍缺乏超越精神，现实主义的文学定于一尊，政治标准高于艺术标准，社会认识意义高于审美意义。这是“文以载道”模式的现代翻版。中国现代作家大都为实用理性所累，缺乏超越感，只有少数自由主义作家能够向“人”而在，向“艺术”而在。在实用理性占支配地位的时候，艺术家探索艺术的空间非常狭小。他们常常被批评为逃避现实，不食人间烟火。自由主义作家看重形式的重要性，便被斥为形式主义；重视美的价值，便被斥为唯美主义。周作人的个人主义文学论、闻一多的艺术必须首先是艺术论、梁实秋的文学表现人性论等，这些至少在学理的范围正确的观点，在它们产生的那个时代往往被批判。自由主义文学是一种承载着个性主义和理性主义的文学创作，它要求文学承载着西方以哈耶克、霍布豪斯、波普尔等西方自由主义者的哲学观念来影响国人的思想。

陈美兰在分析总结现当代文学思潮与论争中的经验教训时说：“应该自觉地保护和发展自身的调节力，而不应把内部的调节力错当作外部的对抗力，予以扼杀。”^② 自由主义作家对文学自身价值的强调，正是

^① 沈从文：《抽象的抒情》，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03页。

^② 陈美兰：《认识面临着第二次超越》，载《武汉大学学报》1988年第3期。